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七〇期 ——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4f)

【专题研究】太阳最红的年代（讲演录，中篇） 辛灏年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专题研究】

太阳最红的年代（讲演录，中篇）

• 辛灏年 •

七、中共发动文革的领袖和理论

（一）中共发动文革的领袖

1、中共发动文革的最高领袖集团就是中共中央

有一个问题，是我首先应该予以进一步说明白的。这就是，究竟是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发动了文革，还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极权专制政党的最高统治集团、即中共中央发动了文革。回答显然是后者，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共中央发动了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我的理由是：

第一、那一场文化革命，自始至终，也就是说从发动到发展直至“夺取最后胜利”，都是由中共中央集体发动和领导的。如我前面所说，1964年7月，虽然是毛泽东建议建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但建立了那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却是刘少奇正在掌握着实权的中共中央，组长则是刘少奇的心腹大将，号称中共第八把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主要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

1966年5月，批判否定“二月提纲”，撤销第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打倒彭罗陆杨，

选举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发出“5 1 6 通知”，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而不是由任何个人或党内任何部门的决定。

1966年8月，是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公开颁布的“十六条”。其中所有条目内容都是由中共中央的这次全会拟定和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算是正式开始“大打出手”。而刘少奇因为“犯了错误”，才从共产党的第二把手降为党的第八把手，也是由中共中央这一次全会所一致通过的。

1968年12月，是中共中央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集体决定将刘少奇开除了党籍。

1969年4月，又是中共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领袖集团。毛泽东因此而重新成为中共名副其实的“党主”，并因此而重新掌控全党和全中国的一切权力。

我只是简单地举了上述这几件可以看得见的“大事”，就已经完全看得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发展和结局，与中共中央——这个中共的最高领袖集团的关系了。

第二、自从1964年7月，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建立文化革领导小组，直到毛死，就是“去向马克思报到”，中共最高领袖集团没有任何人公开地反对过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在中共自1964直到1975整整十二年间，中共的所有文献，都没有记录下任何反对发动文革的意见。而不论是中共的文官，还是中共的武将，也没有一个人公开地反对他们的党中央发动这一场文革。在我们研究所的资料室书架上，放着十二本中共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每年都有沉沉的一大部，可就是没有一份文件里面记载着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有人、或有组织、或有某部门在党内党外反对发动文革的言行。这是我首先要说的。

其次，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不是有很多老干部反对过文革吗？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老干部，老师 and 老将军们……比如说，著名的“二月逆流”，及其发动者叶剑英、谭震林、陈毅等等。对此，我还是要说，大错特错。因为，中共的这些老干部、老师 and 老将们，反对的只是整老干部，却从来没有反对过他们的党中央发动那一场文化大革命！所谓的二月逆流，叶剑英等大闹怀仁堂，甚至传言说他因为发脾气拍桌子而拍断了手指，但他们反对的，也只是中央文革要打倒一大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中共的一大批老干部。他们非但没有反对发动文革，没有反对打倒刘少奇，甚至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对他们自己的清洗和整治，特别是对文革残酷地迫害无辜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他们更是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的反对。所谓的人民总理周恩来，也只是在文革中保护过少数几个老干部和老部下们，却从来没有保护过那些过于苦难的无辜人民……。一言以蔽之，就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只反对连他们也要反、也要斗、也要整的“部分党内路线斗争”，却不反对事不关己的其他“路线斗争”，特别是绝不反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阶级斗争以残酷地镇压人民和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在残酷地镇压人民和知识分子这个文化革命的“对象”上，他们——包括刘少奇在内，和毛泽东从来都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只是不同意把自己也当作文化革命的对象罢了。

再就是，中共党内虽然存在着对发动文革方式的不同意见和做法，但这也仅仅是对发动文革方式的不同意见罢了，这与反对文革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回事。比如说，在文革中，是要党委领导、还是不要党委领导；是派工作组领导文革，还是撤销工作组？等等。这些都是发动文革的方式问题。虽然在使用何种方式的争斗中，埋藏着可怕的权力斗争，潜伏着残酷的“攻防之战”，甚至是决定着“鹿死谁手”的致命关键，但是，它依然不是要发动和不要发动文革之争。

最后，必须明白的是，在中共党内，特别是他的最高领袖集团之内，不存在反对发动文革的问题，只存在着“由谁来利用和怎样利用文革来达成自己目的”的问题。说穿了，就是毛要借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对党内施行一场政治大清洗，籍以打倒刘少奇，消灭刘家党。用他对埃德加·斯诺的话来说，就是宁肯“断然毁掉这个党”，也要打倒刘少奇，然后再建立一个绝对服从自己的共产党。而刘少奇则企图借牢牢地把握着中共的层层领导权，从而能够掌握着发动和领导文化革命的层层权力，这样，毛泽东就不容易打倒他，也清洗不了他的刘家党。说到底，就是“毛要整刘、刘要自保”。

除此之外，在所谓反修防修的共产政治大方向上，在制造阶级斗争以残酷迫害无辜人民的问题上，刘和毛并无分歧，也从来就没有分歧。刘少奇自己就说过：“最近几年，我也想过如何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如何才能使无产阶级夺到手的政权不至于又失去，如何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至于像苏联及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刘不仅是想，而且在1964年9月由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中，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他所采取的四清路线，不尽打击面极宽，而且也更加残酷，连毛都认为太“左”了（宋毅军：艰难曲折的抗争）。尤其不应忘记的是，刘少奇在1966年的六、七两个月中，曾根据毛泽东的“横扫”号召，更为“杀民以自保”，在全中国制造了无数的文革血案；也不要忘记了，将全国大中小学停课半年闹文化大革命，将全国各级升学考试推迟半年、甚至取消现行高考制度的史无前例的行为和决定，就是刘少奇亲自主持党中央的会议所作出的……。

大家看一看，中共发动文革的最高领袖集团是谁呢？当然是中共中央！就不说毛泽东始终都是这个中共中央的主席和这个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反过来，倘若没有这样一个总是“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倘若这个中共中央曾坚决地反对过毛泽东及其阴谋小组织发动那一场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还发动得起来吗？单从1966年7月到1966年5月的近两年间来看，仅仅因为在这个时期内，刘少奇还掌握着党的实权，毛泽东和他的阴谋小组织不就是只能煽阴风、点鬼火，只敢从侧面进攻和从外地发难吗？

2、中共发动文革的最高领袖及其“阴谋领袖集团”

中共虽然本身就是一个发动文革的最高领袖集团，但中共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领袖和第一位领袖，自然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是中共中央的主席，不是他发动，没有他同意，也发动不起来。就不说发动文革原就是毛的“本意”了。但在1964年7月到1966年5月那个尚局限在文化学术领域内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却不是发动和领导它的唯一领袖，甚至在这个时期，毛几乎丧失了对文革的正宗领导权和发动权。所以，他才要建立绝对忠诚于自己的“阴谋小组织”从侧面发起攻击，和被迫到外地去寻找地盘来对刘少奇控制的中央发难。但毛泽东还没有丧失中共“伟大领袖”的最高地位，特别是他在六十年代上半期为神化自己而持续发动造神运动的成功，再加上他在“二月提纲”事件、阴谋策划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暗渡陈仓地夺取中共最高舆论权、特别是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连续胜算，终于逐渐地、迅速地、绝对地使他成了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唯一领袖和最高领袖。1966年8月，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终于用中共“党的文献”的方式，确立了毛泽东是领导文革的惟一领袖和最高领袖。至于毛究竟是怎样连续地夺取了胜算的，就正是我在后面要详细说明了“谋略和过程”了。

但中共发动文革，还有一个“阴谋领袖集团”，它的前身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毛的“阴谋小组织”。只因这个“阴谋小组织”在1966年5月竟然“登堂入室”，不仅从“非法走向了合法”，而且以他们组成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1966年5月成立的第二个“文革小

组”，并从此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开始领导那一场文化大革命。所以，这个“阴谋小组织”的性质，才开始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结果，便使他们从“阴谋小组织”变成了中共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公开领袖集团。但它还是一个阴谋领袖集团。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搞阴谋。

当然，这个“阴谋领袖集团”绝不简单地只是中共后来所指称的所谓“四人帮”而已。因为：一是这个“阴谋领袖集团”的第一把手，就是毛泽东。所以，即便是依照中共自己后来的“定案”，也应该是“五人帮”，而不是“四人帮”，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帮主”。如果不把毛这个真正的文革“帮主”算在内，则曾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即“阴谋领袖集团”，就不过是毛发动文革的一个“走狗集团”而已。后来在共产党的法庭上，江青那一句“我是毛主席一条狗”的“真情之喊”，早已将一切包含在不言之中了。当然，这就同样证明了，我在前面所说的，中共根本就没有彻底否定文革。因为，中共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至今都还是“只抓从凶，不究首恶”。

二是这个“阴谋领袖集团”，在整个文革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在进行着“吐故纳新”——这可是毛在文革中的一句“最高指示”，各式各样的造反派们也曾热烈地敲锣打鼓、高喊口号地欢呼过这个“最高指示”发表的。就是说，毛泽东这个“帮主”，为了他自身夺权的需要，曾对这个集团不断地“打出去和拉进来”。也就是说，毛曾不断地要把那些不听他的话，或不够听他的话，或被怀疑是不听他话的，或已经在暗中参加了党内其它政治集团的，或仅仅是为了“舍车保帅抛卒”而必须交出去的人，清除出去，如先后遭遇毛怀疑和打倒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曾为毛阴谋夺权功勋卓著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曾为毛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文革打手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与之同时，他也不断地要把被他认为是真正忠于自己的人马吸收进来。当然，最后他只能相信的，就只有“四人帮”了。所以，中共文革领袖集团始终是以不变的毛泽东夫妇和其他可变的成员来组成的。

三是这个阴谋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早在1966年5月，就被毛全部拉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才是这个原来仅仅属于毛个人的阴谋小组织，之所以能够成为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阴谋集团”的原因。后来，就是在1967年2月之后，毛干脆将他的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共的政治局。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就不仅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领袖集团，而且成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集团的核心力量。当然，这个阴谋领袖集团的领袖就是毛泽东。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至为重要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对是中共发动和领导了文革，和中共绝不可能彻底否定文革，有更为深切的了解。

（二）中共发动文革的理论

中共发动文革的理论，当然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这个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提出和“完善”了的。从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和提出“党内有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到他正式地提出和完善发动文革的理论，那已经是文革高潮之中的事情了，就是直到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所谓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时，才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提出了六个要点：一是“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六是“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当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这里也不过是要“挂起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的羊头，来卖他非要整死刘少奇和搞翻刘家党的狗肉”罢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这个旨在整杀政敌的所谓理论，却将中共革命、专政、斗争和要继续革资本主义命、革修正主义命的所谓政治使命，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那一套完整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和专政”理论，又一次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所以，这就证明了我在前面所说的，没有马列、没有世界共产革命，没有前苏联及列宁和斯大林向中国强行输入他们的理论和革命，特别是没有一个由他们制造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不会有这一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码是丧失了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理论和籍口。因为，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东西”！

顺便说一句，刘少奇最遗憾的，恐怕就是在他领导着前期文革，并且逼迫着毛泽东只能从侧面攻击和在外地发难时，他没有形成自己领导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理论，这自然也是他终于败在毛泽东手里的又一个原因。

八、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和过程

说在前面：

中共发动文革有两种战略和两个过程——兼说中共发动文革的主谋略和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

1、关于“维护和颠覆党内现存秩序”的两种战略

如果说，我已经将中共之所以发动文革和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的内外原因、历史经验、时代条件、社会基础以及领袖理论作了说明，那么，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中共为发动这一场“史无前例”所采用的谋略，和由这些谋略所制造的过程了。

自然，所谓谋略，就是阴谋；所谓过程，就是斗争。前者使得整个文革无时无刻不与阴谋相联结，后者则使得整个文革自始至终都充满着血腥。如果不是必须回头反思和必须否定那场“史无前例”，我实在不愿意再来回首这一段由“阴谋加血腥”所铸成的肮脏而又罪恶的历史及其制造者们了（我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讲演这一部分内容时，听众和我自己同样都感到了难耐的压抑，很多人告诉我，他们真的感到透不过气来，因为实在是“太黑”了——讲演者附记）。

但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和为了那场“史无前例”不再重演，我们还是要把它说清楚、道明白。

我首先要说在前面的，就是中共发动文革有两种战略。这两种战略决定了中共整个文革“内讧”的两大斗争原则和两大斗争方向。而且确实如毛泽东所言，是“你死我活”的一场较量。而之所以说有两种战略，就是指文革的两大对立面，毛和刘，都各有一个建立在各自根本立场上的总战略。

在刘，就是“必须维护党内的现存秩序”。因为，只要“维护住了党内的现存秩序”，就能维系刘家党的实权和地位，就能拥有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正宗党权，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和要求，并依靠共产党这部机器的“惯性”，来保护刘家党和保护刘少奇自己……。

在毛，则是“必须颠覆党内的现存秩序”。因为，对于已经失去了党内“实权”的中共中央主席来说，唯有“颠覆了党内的现存秩序”，才有可能夺回党的“实权”，才有可能夺取文化革命的正宗发动权和领导权，才能够达成打倒刘少奇、清除刘家党和建立毛泽东个人“党主”统治的目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对他的美国“马屁友人”埃德加·斯诺所说的，他宁肯“断然毁掉这个党”，也要打倒刘少奇，便是这个意思。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一再说过的要“大破大立”、要“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也是这个意思。

2、关于前期文化革命和后期文化大革命的两个过程

我们只有看清楚了毛、刘双方各自绝然相反的总体战略，也就是“内讧”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才能够了解文革还有两个过程。因为这两个过程，是由他们各自的总体战略所决定的。

这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从表面上看，斗争的范围尚局限在文化、学术和思想领域之内，专以党内外文化人、学者及知识分子作为斗争对象，但实质上，则是毛刘之间一场夺取和维护“发动和领导文化革命”权力的殊死斗争。第二个过程，则是将斗争扩张到政治以及各个领域，并以疯狂夺取最高政治权力和各级政治权力作为最高目的的“后期文化革命”，或者说是“正式开场以后的文化革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革的前后两个过程，在实质上，就是前后两个夺权的的过程。

在第一个过程中，在毛，由于仅仅是搞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根本就不是他的本意；二是因为他失去了党的实权而无从正面领导和发动这场革命。所以，如我在前面所说，他采取的就是“以文化界为突破口，阴谋发动，侧身进攻；以学术批判为手段，籍古打今，制造混乱……”。在本阶段，毛的唯一用心和所有行为都在夺取发动和领导文化革命的党内正宗权力即实权，并且已经确定了“颠覆党内的现存秩序”的总战略。

在刘，发动文革虽非是他的本意，但领导文革则是他的实权所在；还因为制造阶级斗争以镇压人民和知识分子，在他同样是拿手好戏，与毛从无二至。所以，为了将这场革命局限在文化领域，特别是要杜绝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可能，他就必须利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党内实权，阻止毛的“胡来乱搞”。但考虑到毛毕竟拥有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份和伟大领袖的身份，对毛的神话运动方兴未艾，所以，他只能在牢牢把握着党对文化革命发动和领导的实权的同时，对毛要发动的这一场文化革命，“表面赞成，暗中抵制，情势紧张时可以择机反击（比如“二月提纲”事件），必须对抗时则采取顽强抗争（比如借毛同意而大派工作组来加强党对文革的领导，转移毛的斗争大方向）……在本阶段，刘的全部用心和行为都是在用他手中的实权，维护他领导和发动文化革命的党的正宗权力，也就是拼命“维护党内的现存秩序”。

在第二个过程中，在毛，由于他已经从夺取了一部份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权力，到几乎夺取了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全部权力，所以，他立即便从“横扫一切”开始，大打出手；继而公开号召造反，意在彻底毁弃“党内的现存秩序”。目的，就是要从夺取文化革命的领导权走向“彻底打倒刘少奇、消灭刘家党、从而夺回自己对党的全部统治权，建立自己对全党和全国的绝对统治权”。他终于颠覆成功，如愿以偿。毛后来病重将死时发出的“最高指示”，就称他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打倒蒋介石，第二件就是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因此，所有企图对中共发动文化革命涂脂抹粉的共产党学者、专家，和对文革至今依然怀有深刻恋情的极少数前造反派人士，只需重温“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个“谆谆教导”，也就不必白费心机了。

在这个过程中，刘由于前期的“表面赞成、暗中抵制”没有成功，“择机反击和顽强抗争”又接连遭遇失败，在对毛的疯狂造神运动和革命群众对他的疯狂造反革命中，他不仅迅速失去抵抗的力量，而且只能“承认错误以求自保”。但毛“追穷寇”的精神和残酷的整人手段，终使

他，还有他的刘家党全军溃败，使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党的权力，迅速瓦解在这一场目标就是要打倒他及其所有党羽和各级党羽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3、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中共发动文革的主谋略

毛既然策定了“必须颠覆党内的现存秩序”这样一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总体战略，那么，毛的所有谋略就在于如何才能“颠覆党内的现存秩序”了。于是，毛便有了一个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一句话，便成了文革期间人尽皆知的“名言”，特别是各家“造反派战友们”个个都要“歌功颂德”和竭力听命追随的对象。

但是，应该说清楚的是，毛毕竟不是神，也就不可能“料事如神”。也就是说，一切并非早已为毛所预料，一切也不可能为毛都算计好了。所以，毛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虽然在文革的第一个过程、即前期“文化革命”中，终于获得成功；但在第二个过程、即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在他已经有能力、有实权号召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为他造刘少奇反的时候和之后，他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非但不是一帆风顺，而且乱象环生，甚至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险局”。所以，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才需要不断更新和出新，就是需要不断地设计新的阴谋，策定新的谋略，以应付局面，克敌制胜。如此，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就在他不变的“颠覆党内的现存秩序以打倒刘少奇和摧毁刘家党”这个“文革大方向”之下，形成了一系列由毛策划或拍板，并由他那个已经登堂入室的“阴谋领袖集团”即中央文革小组所执行的谋略，说白了，就是“一连串的阴谋”。

应该清楚的是，由于毛的这“一连串的阴谋”，既贯穿在文化革命的全过程中，又左右了文化革命的全过程，更使毛在中共发动的文化革命当中，完全如愿地实现了自己要实行党内大清洗即打倒刘少奇、清除刘家党、重新确立毛对全党统治之绝对地位的政治欲望，以至无论是在党内党外，毛都达到了建立他本人的绝对党主式统治和超级君主式统治的目的，所以，整个文革的发展和过程，就与毛在“颠覆党内的现存秩序”这一总体战略之下所制造的一切“伟大战略部署”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将毛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全部谋略和整个过程，当成中共发动和领导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谋略和主体过程。也就是我今天要讲述的“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和过程”。

4、毛“伟大战略部署”的内容和本相、性质和特征

“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内容和本相：

我在这里所说的内容，是指“贯串内容”，就是贯串在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中的主体内容，即主谋略。概括起来说，就是“阴谋发动与放手一搏”。

应该说，正是这个“阴谋发动与放手一搏”，才贯串了毛“伟大战略部署”的始终。而毛之所以决心要“阴谋发动与放手一搏”，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借文革打倒的真正对象，是在党内，并且是党的一个掌握着实权的重要政治集团和庞大政治集团，这个集团的领袖又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和马列中国的国家主席，而不是手无寸铁的普通“阶级敌人”或“新老阶级敌人”，更不是普通民众和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毛想通过正常的党内斗争途径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再加上他早已失去了党内的实权，所以，他就只能采用绝不能按照常理出牌的“阴谋发动”和“放手一搏”，所谓“不得已而为之”。他知道自己是要承担风险的，因为他已经是“背水一战”了，只能赢，不能输。

如果我再说得更具体一点，所谓阴谋夺权，就是指不择手段地秘密策划和精心策划；所谓

放手一搏，就是指不顾一切地公开夺权和残酷夺权。这既是整个文革自始至终都为可怕的阴谋所左右，又是整个文革自始至终都充满血腥的根本缘由，更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发动文革“夺回权力”的政治本相暴露得淋漓尽致。这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本相，也是中共在发动文革的全过程中，一再地、持续地和不厌其烦地高喊要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坚决反对“干扰运动大方向”的根本原因。而这个本相与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朱元璋为儿子能够顺利接班掌权而残酷地屠杀开国功臣，洪秀全无耻地制造“天京之变”以消灭实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及其三万部属，特别是斯大林搞政治大清洗以残暴地和大面积地杀害自己的党人，在本相上实在没有两样，都不过是一场残酷的内讧罢了。

“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性质和特征：

第一是欺骗性。这个欺骗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革命的名义”。列宁的这一句名言，曾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掩盖过俄国共产党“革命”的无数罪行和滔天罪行，同样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血腥残忍“革命”起到过极大的和历史性的欺骗作用。到了文革，毛虽然决心要刘少奇垮台、刘家党灭亡，纯属一场拔刀相向的巨大“内讧”，但他又一定要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说成是刘少奇和刘家党既要搞修正主义，又要复辟资本主义；既是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更是混进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而证明他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正确性”。

第二是虚伪性。亦一言以蔽之，就是毛也要“顺天应人”。也就是说，毛要借用中国古代君主所谓“上顺天命和下应人心”的变革天命理论。在他，就是要“上顺马列革命之天，下应拥毛造反之人”。这样，刘才不是毛要打倒的，而是人民打倒的；刘家党才不是被毛灭亡的，而是他们自取灭亡的。说白了，毛既要杀刘，灭刘家党，还要人民和历史承认他杀得对、灭得对；杀得万岁，灭得万岁！从而将一场党内的巨大内讧“丑戏”导演成一场“是人民要革命造反”的历史“正剧”。这不过是中国专制历史上那些坏君主的虚伪性在毛身上的恶性重演和极端表现……。所以，毛才会将他意在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马列的共产革命紧密连接，大加“发展”，甚至吹嘘他发动文革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所以，文革期间的许多革命造反派们，才会不分旗号门类，都要高喊“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都要拼命“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都曾因毛“顺应”了他们的“革命造反民心”，而自觉地、热切地和疯狂地作了毛的工具和炮灰，甚至在被毛一再地将他们置于“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境地之后，少数人仍然“九死而未悔”。以至直到今日，还有人在为他们当年曾跟着伟大领袖造反革命而骄傲；更有甚者，竟然将那一场紧跟毛参加共产党残酷内讧的历史，当作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开张”的序幕……。我曾一再地告诉海外一些普通的“练功”朋友说：“共产党制造了愚昧，愚昧制造了我们。”该是我们自省的时候了（请注意，我在说这话时，是把我自己包括在内的）！特别是当年曾疯狂过的“造反派战友们”和今日“造神运动”之真诚热切的参加者们。

第三是阶段性。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纵观整个文革，可以分为两个过程。在这两个过程里，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固然在其欺骗性和虚伪性上别无二致，但由于阶段的不同，毛所策划的阴谋和采用的手段还是大不相同。在前期，毛因早就筹划在心，蓄谋已久，所以，他使出的以文化界为突破口，以学术批判来点火煽风，和从“侧面进攻、外地发难”等等阴谋，都是他在不得已之下“深究谋略、细考手段”所得。但到了第二个过程，也就是他和刘家党已经开始正面交手之后，他所面临的则是不断的变局和意想不到的变局了。此时的毛及其阴谋领袖集团，也就不得不在文革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非但要“深究谋略、细考手段”，而且更要“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比如我后面就要说到的，对于彭真搞出个“二月提纲”来抵抗他的阴谋进攻，刘少奇在他同意下大派工作组以改变他的“斗争大方向”，叶剑英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在怀仁堂开始拍桌子骂娘，“十六条”颁布之后几乎全国各地的“走资派”都在“造反”的旗号下

建立“保皇”组织以自保，甚至到了后来，连那些原来十分听话的革命小将，竟然把他的“最高指示”也不想当一回事情了……。面对这种种的变局，他就必须及时地制定出一个又一个对内对外的重大谋略，以务必“克敌致胜”，和必须“平息内乱”。这就是毛“伟大战略部署”的阶段性的由来。

第四是可变性。由于有了阶段性，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就自然出现了可变性。但这还不是我要说的可变性。我说的可变性，指的是毛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所造成的毛伟大战略部署的可怕内容、复杂变化和荒唐不经。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哪怕是象我这样的“逍遥派”，也不可能不知道，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常常是极其复杂、可怕和荒唐的。再加上为了不断地神化毛的每一个“伟大战略部署，也就更加地制造了它的可笑性。虽然，这个可笑性，却常常包含着太多的血腥味。比如，明明是毛的伟大战略部署要抓“军内一小撮”，可是，就因为“军内一小撮”抓了可能会导致“翻船”，所以，毛的“伟大战略部署”马上便风向一转，变成了“不许毁我长城”，曾为他“抓军内一小撮”的文革大功臣王力、关锋、戚本禹便从此沦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下囚了，伴随着他们掉了脑袋的，便是跟着中央文革“大抓军内一小撮”的一大批“造反派”们。再比如，“5 1 6”兵团原来明明是针对周恩来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但只因“反周国必乱”（——毛1975年的“最高指示”），后来便专门发动了一场清查“5 1 6”的运动，将一些曾经真心铁意要跟着毛革命造反的青年学生抓的抓、杀的杀，直至数年之后方才说是“冤案”而不了了之。至于千千万万曾在“十六条”的煽动下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造反派们，毛的伟大战略部署虽然他们起来造反的旗号，但不过两年，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就变成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一大批曾不惜性命都要为毛“造走资派反”的“造反派”们，便立即成了毛伟大战略部署下的囚徒、甚至是冤鬼了。当然，最可笑的还是林彪事件。因为林彪明明已经是党章、宪法上规定的“革命接班人”了，就等着毛去向马克思报到，他便好接班做“万岁”，这不可不谓毛的一个太伟大的“战略部署”了。但当林彪从天上掉下来摔死之后，这个涂抹着“林副统帅”鲜血的伟大战略部署，就变得荒唐和可笑得令人难以置信……。诸如此类的可变性，实在是充斥在毛的太多“伟大战略部署”之中，我将在后面具体叙说文革的谋略与过程时详细加以介绍。

第五是残酷性。之所以说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还具有残酷性，其一，如我前面所说，整个文化大革命，都是以制造阶级斗争来“保证”路线斗争的安全和需要的。说到底，就是要以制造阶级斗争镇压和屠杀无辜人民、特别是无辜知识分子，既为那一场“史无前例”大敲开台锣鼓，又为那一场“史无前例”埋棺陪斩，更要为那一场“史无前例”高奏血腥的“胜利凯歌”……。因为，在毛泽东最重要的“伟大战略部署”中，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谆谆教导”，不仅贯穿在他那个“伟大战略部署”的始终，而且贯串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岁月里。如果将来我们一定要查明白文革中到底被共产党和毛泽东害死了多少人，则被害死的无辜民众，也就是被某些“造反派战友们”至今都认为是不值一提和绝对不值得研究的“普通人”，至少是共产党走资派的千倍和万倍（请参阅本期发表的王友琴教授的文革史研究专著：“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其二，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不属于所谓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共产党干部，包括更多的无辜民众，绝大多数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和种种的酷刑相待，而且那些由红卫兵和造反派发明和创造的种种酷刑，几乎全部是公然执行的“私刑”，即所谓“批斗”。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专制王朝都绝不允许的，也都没有过的。凡遭遇过那些“私刑”折磨过的人，有的当场即成了冤鬼，有的则寻机自杀了却了此生，有的则留下了终身的残疾。由于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在执行种种残酷私刑时，绝大多数又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和大庭广众之中，其因遭遇极端的羞辱而造成的心理残害和性格扭曲，几乎伴随着被迫害者终生（仍请参阅本期发表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无辜民众当然永无雪仇之日，但对于那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们来说，机会却在等待着他们。共产党的老干部们平反复出之后，特别是文革结束，当他们重新登

台亮相、操刀掌权之后，老干部们对造反派的仇恨和报复，自然也是极其毒辣的。因为他们终于等到了能够“秋后算账”的那一天。

其三，毛泽东的残酷和斯大林的残酷不一样的地方是，斯大林只需干脆果断地消灭政敌们的肉体，毛泽东则不仅要整杀政敌和民众的肉体，而且更要整杀政敌和民众的灵魂，扭曲他们的心灵和人格，以至于在文革中竟有造反派战士在被押上刑场时，还要高喊一声“毛主席万岁！”而不知道自己就是死在毛的手里。这样的事实，在文革中，实在是屡见不鲜，足令今天的年轻人“万思而难得其解”。再说，斯大林只是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刀把子”来杀人，毛泽东则用所谓的“群众造反”和“群众专政”，变出无穷的花样来整人和杀人，没有整死的也要被他们整得“生不如死”。文革中，被毛的一个个“战略部署”逼疯逼呆逼痴逼傻的男女老少，实在是数不胜数。

其四，就是那些曾紧跟毛主席他老人家造反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革命闯将和各式各样的“革命造反派”们，在伟大领袖感到大功告成，己该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了，于是，在他们当中，被毛藏起来的“良弓”屈指可数，但被毛也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烹掉的“走狗”，真不知有几千几万、还是有几十万几百万了……。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这样的翻脸无情，残酷之极。造反派们的下场不仅如此糟糕，如此凄惨，而且在他们的伟大领袖已经向马克思报到，甚至他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也已经坐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牢，特别是无数在文革中曾遭遇过他们蔑视、欺辱、专政、甚至是践踏和毒打的“地富反坏右”，都被“走资派”邓小平给予平反、改正、摘帽之后，他们非但至今得不到平反，甚至反而被戴上了“三种人”的帽子，永远也摘不掉。这是不是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所遗留下来的又一种特殊的“残酷性”？因为毛对他们的残酷镇压和走资派们后来对他们的坚决镇压竟然如出一辙。这岂不是天大的冤枉！1980年，有一位造反派出身的“新时期作家”，专门歌颂共产党改革开放的“大作家”，就曾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叫做“血往心里流”，写的就是文革造反派们的冤屈，和时代对他们的过于残酷。那个时候，也正是“走资派”邓小平在对造反派开刀和给他们戴上“三种人”帽子的时候。当然，他们委实是只能“血往心里流”，因为他们连苦衷究竟应该向谁倾诉都不知道，或者说连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都没有……。我想，这大概便是他们在海外常常会为文革发表出一些天方夜谭式的论断的“根由”吧！由于我们都知道各类造反派，特别是曾造过共产党“走资派”反的造反派们，虽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情地迫害过别人，但后来又遭遇过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残酷迫害，甚至至今不得“解脱”，所以，我才对他们同样深怀同情，对他们的某些荒唐的“悖论”表示理解，但却不可能赞成。

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残酷性是说不完的，待我下面具体地叙述文革的谋略和过程时，我再慢慢地告诉大家。

一、发动期的谋略与过程

我想说的是，在毛总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下，中共文革发动期的主谋略就是“阴谋发动和疯狂号召”。下面我开始谈发动期的谋略与过程。

第一、阴谋对党和阳谋对民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的第一谋略即是：“阴谋对党”和“阳谋对民”。因为，这次运动是发动一场党内的“路线斗争”，目的就是搞掉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庞大政治势力。而刘少奇则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在全党全国拥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广泛的政治影响。一般来说，非但许多党的干部一时半会儿不可能理解“打倒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即“打倒自己”的重要性 and 必要性，甚至一定会成为这场运动的绊脚石。所以，毛泽东

就必须“先挂羊头，后卖狗肉”，而不能“一步跨到台口”。就是只能步步诱导，直至达成最后目的。由此出发，毛泽东为这场党内政治清洗运动所设计的高调，就是高喊“阶级斗争”，高叫“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号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共产党的“经”，非但共产党人自己不会反对，不能反对，不敢反对，而且毛泽东一念，大家也只能跟着他念。这就是我所说的“阴谋对党”。

我所说的“阳谋对民”，则是十七年来，共产党从来就是公开叫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也是公开地制造阶级斗争、厉行“阶级屠杀”的。而发动文革对于全社会来说，关键是要让全体人民“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好让毛能够一心专意地按照自己的“伟大战略部署”，去打倒他在自己党内的最大政敌。所谓“公开杀民”，是为了保证“阴谋杀刘”。所以，文革从准备到开场，毛才非但不是高喊打倒走资派，高叫打倒刘少奇，而是嘶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大搞阶级镇压，为这场他要发动的党内清洗，排除一切可能出现的社会干扰、社会阻力和社会不稳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和斯大林一样，首先用大搞阶级斗争和明抓阶级斗争，来保证毛泽东阴谋发动党内斗争的顺利和胜利。

第二、以文化批判准备政治斗争

我在前面——“中共为什么要将一场政治浩劫定名为文化革命”中已经详细说过，中共 and 毛泽东正是首先从文化入手，发动了文化战线上的批判和斗争，即把文化当成了发动文革的工具和突破口，才终于发动了这一场其主体为空前政治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以造神运动先声夺人划定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了文革前毛泽东及其阴谋小组织在党内党外所发起的“造神运动”，即利用各种手段神话毛泽东的运动。它虽是对刘、邓等党内领袖要反对“个人崇拜”所进行的公开反击，更重要的则是它为反对刘少奇直至打倒刘少奇做了极重要的准备。原因——

一是首先造成“先声夺人”的政治局面，以便“高举神像，大打出手”。而为准备发动文革而造神的第一个能人大将，就是林彪。

林彪制造个人崇拜蓄谋已久，早自1959年他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时起，即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后甚至还提出“要99%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随后，他又提出了“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

1964年5月，林彪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从此，“红宝书”问世。它不仅成了中共的“宝贝党典”，而且成了人民的“圣经宝卷”。就不说文革开始后，在中国大陆所出现的铺天盖地的毛纪念章、毛石膏像、毛小红书、毛语录歌、毛的“雄文四卷”和家家都要供着的“宝书台”了……可以说，后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毛泽东的这本“红宝书”的光辉指引下，走向一个又一个“光辉胜利”的。

林彪非但先造宝书，而且大造神话：什么“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什么“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什么“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等等。可以说，自林彪开始神话化毛泽东以后，毛泽东就逐步在党内党外和军内军外被迅速地 and 疯狂地神化起来了。请大家主意，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共八大刘、邓提出要反对“个人

崇拜”之后。也就是说，刘、邓要反对的个人崇拜非但没有成功，中共对毛的个人崇拜反而走向了

对神的崇拜。刘、邓已经败了。

于是，神化毛泽东在文革正式发动前，就已经成了一场文艺运动、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歌颂毛的歌曲诸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北京有个金太阳”“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等等，已经唱彻中国大陆；就不说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于一九六四年就已经搬上舞台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即篡改了中共党史的“东方红”了；更不说整个文革期间，全国人民都要每天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早请示”和“晚汇报”，唱“忠字歌”和跳“忠字舞”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地成了一尊任何人都不能触碰的“神”。这就是所谓先声夺人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之下，还有谁可以成为他的对手呢？还有谁不会成为供在他面前的“牺牲”呢？在毛泽东这尊“神”的面前，刘少奇只是一个人，他要想以他的“人力”来对抗毛的“神力”，非但只能徒唤奈何，而且只能遭遇惨败。因为神的力量是不能抗拒的，神的力量更是“无边”的。后来，当毛、林反目成仇，林彪打算在苏州附近的一座铁路桥下安放炸药炸死“红太阳”时，那位被林彪命令执行任务的军队高官，就是不敢将炸药塞进桥底下去，终于让毛泽东逃过一劫。为什么？就是对毛泽东的神话，使得毛的神秘淫威“无可抵挡”……。

二是划定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如果说先声夺人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则毛泽东已经成就的神话形象，就自然而然地和顺理成章地形成了一个“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因为，神是不能反的；毛泽东是神，毛泽东就不能反；谁反了毛泽东，就必定没有好下场……。这就为文革中几个最响亮的政治口号的出现、甚嚣尘上、甚至成为“尚方宝剑”，造就了一个“最高政治界限”。这个最高政治界限——

就是：“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就是：“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三反分子”的罪名和罪行的成立。

就是：“恶攻罪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的“天罗地网”，终于笼罩到了每一个中共党徒和全国人民头的头上。回首文革，该有多少人惨死在这个可怕的罪名之下。

神话毛泽东的运动，就是为毛泽东造神的运动，终于为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立了一个谁也不敢一碰的“最高政治是非”。在这个通过“造神运动”所制造的最高政治是非面前，刘少奇和他党徒们的可悲下场，似乎早已经被判定了。

我必须指出的是，所谓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并不是说，在中共发动的文革过程中，当真存在着“是与非”。因为在毛刘、毛林、或毛与任何一个他要批斗、打倒、清洗的人之间，也就是在中共文革残酷内讧的全过程中，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是与非”的问题。而所谓是，就是谁赢谁“是”，谁输谁“非”；就是从毛为“是”，从刘、或后来从林为“非”。是绝对地以人画线，而非以事实和道理来画线，充其量也就是简单地以没有是非的“敌我”来画线而已。

第四、否定二月提纲以夺取文革的领导权和发动权

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就是认为刘少奇及其刘家党在文革中，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直到被毛泽东整垮整死为止。这个看法，固然因为刘少奇等的失败甚至是惨死，使得人们

对他们多少给予了一些同情之心，但是，就文革发动和发展的事实来说，并不确切。因为，如我前面所说，1959年之后，刘对毛的“逼宫”就已经一再地取得了胜算；1962年，毛泽东不得不在“十分紧张”的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当时即被与会的共产党徒们称作“刘、邓大军的胜利”；在1964年前后的“四清”运动中，刘不仅与毛对抗，而且将毛要发动的运动成功地纳入了刘的框架，甚至用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取代了毛泽东的“四清路线”……。毛实际上已经日渐地被刘“架空”了。

1959—1966年，在这个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这大概便是毛泽东所说的“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原因），不仅刘少奇已经日渐地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实权，而且刘家党也已经掌握了太多地区和各大行业的实权。所以，第一个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于1964年7月建立之后，中共中央对于文化革命的领导权都是掌控在刘少奇手里的。因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彭真，就是刘少奇最重要的大将，他不仅将北京市委变成了一个令毛自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刘家党领地，而且也让毛为发动文化革命才建议成立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毛的种种“最高指示”置若罔闻。了解了这个基本的事实，才能理解毛为什么要避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江青到上海去暗中结党，就是阴谋建立小组织，并首先在上海发难；了解了这个基本事实，才能够了解为什么毛又要避开中央文革小组，让江青勾结林彪，先从部队的文化革命做起，然后再“由军及党”，将毛认定的那一条对抗他的革命路线的“黑线”，首先公之于众，然后再公之于党。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1964年7月就已经建立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非但不听毛的指挥，违背毛的本意，而且与毛对抗。换言之，就是中共中央发动和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毛泽东“鞭短难及”。

虽然这个局面既违背了毛要建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初衷，又使毛一心要发动的文化革命根本不能按照他的意图发动起来，甚至逼迫毛不得不利用自己被神话化的伟大领袖地位，一是公开地和一再地对外放话，将文化界当作他的突破口，另搞一套；二是利用江青建立“上海帮”，即他的阴谋小组织，在外面和在下面先闹起来。但是，由于刘少奇、刘家党及其掌握的中央文革小组，鉴于毛既有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份，又是本党早已确认和长期歌颂的伟大领袖，眼下神话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又是方兴未艾，所以，他们虽掌有党的实权，却既不能公开与毛对抗，又不能公开反击江青和林彪，只能暗中抵制，这就使他们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守势”，处于被动的地位。

毛的行为，特别是江青和林彪的行径，刘家党不可能不知道。因为，毛一再置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于完全不顾而对文化界、学术界和“文艺黑线”公开点名和批评，特别是戚本禹“批叛徒”的文章和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所已经引发的批判风潮，已经造成了一片风声鹤唳的局面，而由这一切所公然亮出来的批判斗争锋芒，不仅来头明确，而且对象清楚。这就使刘家党面对毛泽东从“边锋”和“外地”杀出来的“意在沛公”的文革阴谋，不得不开始防范，甚至不得不予以反击。因为他们显然知道，毛泽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就是1966年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二月提纲”之所以出炉的来由。刘、邓和彭真等，企图利用手中的党权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领导文化革命的正宗权力，批评戚本禹的“影射史学”以维护吴 i 和翦伯赞，反对姚文元的“公开挑衅”以回护党的领导人。名为文化革命“纠偏”，实为刘家党自保。

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终于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不仅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而且强调要加强党对文化革命的领导，要求点名批判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借以公开保护吴晗等人，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表面上虽然是针对着戚本禹、特别是姚文元的“文风”而来，但实际上却是在反击毛正在制造的“文革阴谋”。“提纲”虽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讨论通过，发出以前，怯于毛的领袖地位，彭真还是不得不就“提纲”向毛请示，毛虽

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在党内发布，他是要“放蛇出洞”。于是，彭真便趁机于2月12日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签字转发了这个“提纲”。

但是，刘家党试图以这样一个正宗的“提纲”来限制毛的文革阴谋，毛怎么会不清楚？可以说，这是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吹响了毛家文革阴谋的号角之后，刘家党对毛所进行的第一次公开反击。毛更清楚，刘一如既往，还在想着要把毛泽东想发动的文化革命，以党的名义和他所控制的中央党权纳入刘家党的“正轨”，就象刘曾将他要搞的四清运动，纳入刘的夫人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一样，也就是为刘家党所掌控。这就决定了毛非推翻这个“提纲”不可。更何况，如前所讲，多年来毛早已形成的伟大领袖地位，数年来神话毛运动的“伟大成果”，早已经造成了只能“架空毛而不能公开地反对毛”这样一种局面。而由江青、林彪已经一再发起的攻势，也已经不断地在获得胜算。还有，就是全党全国对又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临的全面恐惧局面也已经形成。自然，这一切已经决定了“二月提纲”必然失败的命运。

毛要以“二月提纲”来“借力发力”，以颠覆刘家党的重镇京畿之地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1966年5月8日，经过林彪和江青的幕后部署，“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署名高炬、何明的两篇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与“擦亮眼睛 辨明真假”。其矛头不仅明攻“三家村”和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而且毫不隐晦地指向了彭真和北京市委。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又发表了姚文元炮制的“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一文，公开指责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和机关报——“前线”和“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都是“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

一场“以外攻内”和“以神压人”的阴谋夺权战略终于在会议期间打响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那个“阴谋小组织”起草的、和由毛泽东亲自拍板的中共中央“通知”（后被称为“516通知”）。“通知”在全面地和严厉地批判了“二月提纲”并指控“提纲”是彭真的“个人阴谋”之后，宣称：“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毛犹嫌不足，紧接着他又在上海严厉批评《二月提纲》，佯装着对刘少奇、邓小平等没有从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高度及时支持姚文元文章，表示强烈不满；指责他们“只反国际的修，不反国内的修”。毛还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毛的政治意图已经跃然嘴上，其后的文革也就是这

么干的。18日，林彪也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颂扬毛泽东的“天才”，暗示党中央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

正是这一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使得前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垮了，其组长彭真自然也垮了。毛泽东甚至趁热打铁地将不听命于他、因而被他称为“阎王店”的中宣部“阎王”部长陆定一，和对他安装录音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一并打倒了。为了笼络住林彪，毛泽东甚至早在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由他亲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扩大会议上，就听凭林彪以“反对突出政治”的罪名，搞掉了解放军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于是，“彭陆罗杨”这个反党集团就“顺理成章”地被挖出来了，林彪对军队的统领大权也基本如愿以偿。

至此，刘少奇非但没有能够籍用“二月提纲”扭转不利局面，而且几乎只是在转瞬之间，甚至不得不由他出面斩去了自己的左右手，从而失去了北京这块不可少的地盘，失去了一部分一直操控在刘家党手中的舆论权力，和党中央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在表面上不得不顺从毛泽东淫威的刘少奇及其党人，第一次公开抗拒就此惨败。而毛泽东不仅夺回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党权，而且他那个“不合法”的班子，也就是以他的老婆为核心的坚强的和不择手段的“阴谋小组织成员”——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终于全部“登堂入室”，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成员和中坚力量。文革的“阴谋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从而将发动和领导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部分正宗权力，开始掌握到了毛家帮的手中。可以说，这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属”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第五、阴谋策划群众造反、夺取最高舆论权以掀起文革狂潮

新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以及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清一色毛帮人马，就是毛的那一个“阴谋小组织”，特别是他们全部进入了政治局，开始成为中共权力核心的一部份，这自然使得毛泽东的愿望基本得逞，也使他们的“阴谋小组织”志得意满，“文革干劲”倍增。但是，正是在与刘家党“二月提纲”的较量中，使毛清楚地看到，他所要发动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绝非易如反掌。因为，一是他早就看到了刘家党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扎在中央，遍布国中，不是解决了“彭罗陆杨”，就可以大功告成的，刘少奇离倒台，刘家党离崩溃，还早得很。二是他明白，这一场意图解决刘家党的文化大革命，实际就是一场残酷的政治内讧，要想得到党的各级干部和所有干部的支持，是很不容易的。过去发动的历次运动，都是“整民”，而这一次是“整党”；过去是“杀民”，这一次是“杀党”。他若是还象过去一样，将党徒当成革命的力量，则起码刘少奇已经掌握的党内力量，就不可能响应他，甚至要暗中反对他。就不说那些必定要“自保”的党的各级官员们了。所以，在他还不能将自己要整掉刘家党的意图，公开地和明白地告诉全党全国之时，他还必须善用谋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何况，毛要打倒刘少奇，还必须“上顺马列革命之天，下应拥毛造反之人”，就是既要借用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又要利用“是人民要造刘少奇反、革刘少奇命”这样一个籍口，这就需要时间和谋略来继续制造欺骗和进行煽动。

现在，当他终于夺取了发动和领导文革的相当一部分党的权力之后，他第一个需要做的，就还是要让火从下面烧起来。这就需要两件事情，一是“点火”，二是让火势“蔓延”开来。对前者，他早有决策，要想攻击刘家党，就必须自下而上，借鉴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经验，到民间去阴谋点火；要解决掉刘家党，就要接受他1964年发动四清运动和现在发动文化革命的教训，这一次不能再由着刘家党改变他的“斗争大方向”。

这一把火，也果真为他所点燃起来了。那就是康生早已秉承毛的旨意，派他的妻子曹轶欧到北大蹲点。曹则按照康生的意图，找到了北大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哲学系的另6位

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经过一番谋划，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向北京市委的大学部部长和北大的党委书记、校长开火。这自然是反右之后，第一张将斗争矛头指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大字报；也是自1964年7月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以来，所公开贴出来反对党的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由毛及其“阴谋小组织”，彼时已经是堂而皇之的中央文革小组，用阴谋手段制造出来的大字报，立即被毛泽东认定并高度评价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全文，全国上下立即兴起了造反运动。6月2日康生来到北大支持聂元梓，赞扬其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毛要从基层和民间点火的阴谋初战告捷。

为了让火势蔓延开来，毛又在阴谋制造基层造反、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同时，阴谋抓回中共中央的舆论权，说白了，就是抓回中共的喉舌和第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权力，还有就是统归中宣部“阎王店”管的中央电台和对外宣传部门的权力。否则，“革命人民”要造反的消息，“党的基层”所贴出来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就是毛泽东的意图和部署，就不能为全党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所知道。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悲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面对人民日报机关那些正在为党的“第一喉舌”竟然在文化革命中落后了而“感到痛苦”，因而闹腾着要造反、并要求中央派驻工作组以突破报社压制的“革命群众”，居然派出了以陈伯达为首的文革第一个工作组去“灭火”。他们却不知道，早已经向毛家帮暗渡陈仓的陈伯达，这个共产党的笔杆子，毛泽东的前秘书，毛、江阴谋小组织的成员，虽肩负着刘少奇和邓小平派他去人民日报“灭火”的使命，但他去人民日报的真正目的，却是衔毛之命去“点火”。

1966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并接受了毛泽东指示的陈伯达，终于衔命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志在“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5月31日下午，就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向新闻界宣布中央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前几个小时，陈伯达却在钓鱼台授意他秀才班底中的钱抵千、尚力科和朱悦鹏等起草发动文革的社论。陈伯达对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陈伯达还说，“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明天6月1日，就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于是：

1966年6月1日，陈伯达主持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题目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2日，陈伯达主持的人民日报又紧锣密鼓地发表了社论，题目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同一天，为毛及其“阴谋小组织”——中央文革小组一手策划的，已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终于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评价赫然纸上，犹如一声发了疯的进军号令。

聂元梓终于成了毛用阴谋制造出来的文革“遵命造反”第一人，火终于从共产党基层点燃了起来。一场由毛发动的群众造反运动，自此拉开了它的序幕。

人民日报和中共的中央一级喉舌，终于因为陈伯达甘愿为毛卖命，而从刘家党的手中被夺了回来，从此之后，毛已经再不需要利用上海的文汇报来首先发难了。

毛和他的阴谋小组织，终于因为夺取了舆论权而获得了对刘家党的正宗“发难权”，终于因为自下而上地点燃了第一把火，而真正地将文化大革命的毒焰煽动起来了。

遵照毛的意图和谋略，以先搞乱大社会和先抓阶级斗争来发动和保障党内路线斗争的阴谋策略，终于因为共产党文人陈伯达的紧跟快办，单单只靠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就掀起了文革的狂潮，就立即血溅了整个中国，就毫不迟疑地开始疯狂地毒害和毒化着人类的灵魂了……

用多年以后国内一些文革研究者的话来说就是：在人们心中，“文化大革命”就是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开始的，虽然没有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为根据，但是灾难降临之日就是《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中华大地变得混乱、污浊、血腥和毫无理性可言……”（原载《同舟共进》2004年第6期）。

用共产党喉舌的话来说就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历史以鲜血所记录下来的事实则是：正是从六月一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起，在全中国（台湾除外），十七年来被共产党整够了、却还没有整死的“运动员”，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们；还有十七年来一直看着别人被整，参加整死别人，甚至是积极地参预了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对人民和同类曾横加迫害的各种人们；都一起开始尝受无产阶级专政史无前例的批判和斗争了，他们被逼得跳楼的跳楼，投水的投水，悬梁的悬梁……

毛泽东和他那个已经登堂入室的“阴谋小组织”——中央文革小组，正是从“横扫”开始，首先搞乱了整个中国社会，更用无数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民的鲜血，为他要搞乱自己的党，和对自己的党进行一场斯大林式的政治大清洗，制造了进行“乱中夺权”的社会基础，即执行了为发动一场党内的残酷内讧所必须具备的“党外血腥专政”。从此，刘少奇及其党人便徒有节节抵抗和节节败退的厄运了，人民只有在毛泽东的每一个伟大战略部署中，被欺骗，被愚弄、被利用、被宰杀、更被无边的恐惧紧紧地捆绑住了自己的身心……犹如洪秀全，虽然为了杀掉一个杨秀清，却杀了整整三万天国将士、染红了扬子江的江水一样，只是毛泽东的残酷与阴毒，远非洪秀全们所能相比。

第六、以指斥对方犯错误全面夺取文革领导权和发动权——关于“工作组”的一场政治较量

文革期间，在造反派中间，曾流传过一句名言，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的：“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这当然是阴谋政治的一种典型表现。但是，就文革而言，这句“经典名言”的事实来源，就是指中共中央派工作组领导文革一事。戚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用抽身事外的诡计，听任刘少奇派工作组整群众，而得罪了群众；毛泽东解放了群众，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地就拥有了群众并获得了发动群众造“刘邓路线”反的巨大政治契机。

我今天需要说明的是，戚本禹的话顶多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毛泽东并不是神，他不是早已决定抽身事外，有心诱导刘、邓犯派工作组的错误，从而带来了群众起来造“刘邓路线”反这样一个政治结果；而是他本人，在仍然没有完全夺回中央的实权之时，也就是说，在刘少奇仍然在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就是日常工作之时，他对于刘少奇召集人马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和作出派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的决定，他是没有办法反对的。这是其一。

其二，为发动和领导文化革命而派工作组，虽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甚至是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所共同决定，但他们是向领袖毛泽东汇报过并且得到了毛的同意的。毛为什么同意？因为，如我前面所讲，第一个工作组就是派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刘、邓的意思是“灭火”，而毛的意图则是“点火”，是要夺取被刘、邓中央控制的人民日报舆论权，然后由人民日报把火点到全国去。只因为陈伯达与毛、江早已“暗通款曲”，甚至已经是毛、江阴谋小组织的一员，所以，他才会背负着刘的指令，却按照毛的指示，去为毛发动人民日报的革命群众造反。这才是毛之所以一开始曾表示同意派工作组的真实原因。所以，当刘少奇和邓小平，包括被蒙在鼓里的周恩来，在派陈伯达去人民日报同时，又派了由他们组建的“华北工作组”去了北大，毛在当时自然不好说什么。

其三，当刘少奇于6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邓小平等一起听取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之后，鉴于北京市委领导向中央提出“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他们不仅同意北京市委在汇报中提出的关于运动的八条要求，而且刘少奇还据此认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因此，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秩序，要把学生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轨道”。邓小平甚至更明确地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10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他们遂按照516通知的指示，决定派工作组到学校，整肃原学校的领导干部和教师，同时控制各个学校的领导权和秩序，以这一方式实现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信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同时根据北京市委的建议，决定向北京市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成员分别由中组部从各部委和团中央从机关干部中抽调。于是，全国许多省、市以至县委，也采用北京市的做法，向当地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6月16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甚至决定向陆定一已经被打倒的中央宣传部派出工作组，其用心自然也是十分的显然。其后，直到毛回到北京公然批评刘、邓大派工作组是犯了错误之前，刘、邓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听取有关工作组在各单位领导文革的汇报，讨论有关工作组在领导各单位文革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地、甚至是急如星火地发出对工作组领导文革的有关指示……。刘、邓为了钳制住毛泽东的进一步行动，甚至于6月22日，亲自致信毛泽东，称：“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各级党委和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准备在“七一”党的45周年纪念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请毛泽东批示……。要知道，当年正是在那次大会上逼着毛泽东检讨的刘、邓，此时不但还在眷恋着在那次大会上“刘、邓大军的胜利”，甚至还要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向全国公开发表毛泽东当年的“检讨”，其用心虽是昭然若揭；其担心，也可以略窥一斑。因为，只要他们还能够掌握着党中央权力，还能在全国大派工作组借以领导和控制文革，毛泽东的一切阴谋和欲望便都不能得逞。然而，对此，毛泽东又怎么可能没有感觉，不会觉察，甚至不再谋划新招以进行反击呢？毛泽东当然明白他俩的用心，断然地拒绝了刘、邓的要求。

就这样，在全国，各级党的领导派工作组进入各单位，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领导文革，迅速得以实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发动的文化革命，犹如四清运动一样，又被刘家党纳入了“正轨”。而且这个“正轨”，正是十七年来共产党用来整肃和整杀他们的阶级敌人、异己分子和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血路”。全国各地各级被派驻到各单位的工作组，在各处所领导发动的文化革命，也就和十七年整肃和整杀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如前所述，只是更加残酷、更加血腥、更加公然和更加没有人性而已。

而我要说的另一半则是，这自然不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景象。而所谓不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景象，并不是说，毛泽东当真发了善心，不忍心看到全国普通民众和无辜知识分子在遭受疯狂的迫害。要知道，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所做的，正是十七年来毛泽东曾亲自领导

做过的；刘少奇在这个时期派工作组批判、斗争、逼杀“反动学术权威、各类文化人士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行为，也正是毛泽东要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号召的；甚至是毛泽东在两个月后颁布所谓解放革命群众的“十六条”时，所同样号召的；至于整个文革时期，毛泽东都一直在坚持“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为此而虐杀了无数的无辜人民和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对无辜的人民和知识份子，还有阶级敌人和各类份子，他非但从来没有停过手，其残酷与刘少奇相比，只是有过之无不及而已。如果说，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曾借工作组对人民大开杀戒，则毛泽东就是对人民大开杀戒于整个文革时期，直到他死。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将刘少奇派工作组整群众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呢？而且在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予以制止？这就是毛的阴险所在了，就是毛要等着刘“犯错误”，再来整治他的政敌。

因为，毛虽然借刘、邓要派工作组，而通过陈伯达获得了向人民日报夺权的成功；但刘、邓也乘机同意北京市委的要求，并在北京甚至是全国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毛因同意在先而不好说。但刘、邓派工作组的行为，却立即从根本上扭转了毛要发动文革的大方向：一是毛本来希图的自下而上、由外及内的发动文革谋略，不仅被刘、邓按照党领导运动的惯例，给悄悄地并且是迅速地扭转了；而且更使他谋图的，要自下而上、由外及内地打倒刘少奇和清洗刘家党的运动，反而被刘家党所领导；以至于他要摧毁的北京市委，居然也死而复活；犹如他要发动的四清运动既被刘家党领导，又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一样。所以，以毛的敏锐和教训，他不可能不立即发现这是刘少奇在故伎重演，是刘家党继“二月提纲”之后对他的第二次反扑，即在表面上“顺毛之意”，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却是“反毛之为”，将文革重新纳入刘家党的“规范”，就是共产党的现存秩序之中。一句话，就是再一次“架空”了毛，让毛的目的不能得逞。

但是，一是如我刚才所说，因为毛刚刚同意派工作组以行其私，不好马上翻脸；二是毛在迅速看透了刘、邓的目的之后，在他还没有想到什么好的谋略以对付刘、邓之时，他便决定“抽身事外”了。大家都知道，毛很快离开了北京，并且到武汉畅游了长江，向全党全国人民表示他的“龙体”好得很，根本就不需要“退居二线”，甚至还能身居一线发动和领导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曾在1959年被迫退居二线，才造成刘少奇走上一线，开始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大权，所以，他后来才会在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六五年就已经决心要搞掉刘少奇！）

他如愿以偿。因为，“毛主席畅游长江”，顿时成为全中国的重大新闻，铺天盖地地响彻在天地之间。

然而，毛当真是“抽身事外”了吗？非也。不能一日不搞阴谋的毛，又怎么可能真正地抽身事外，甚至听凭他的政敌们去扭转他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从而让他前功尽弃呢？当然不是。他是在观察和研究刘、邓派工作组的动向和“成果”，他在谋划怎样才能粉碎刘家党的第二次反扑。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刘、邓对毛的反扑是按常理出牌，用党来领导运动，似乎天经地义；但是，从来不按照常理出牌的毛泽东，这一次终于又眼疾手利地从刘、邓派工作组将全国整得血泪横流的“成果”中，找到了击败敌手的重大契机。这个契机就是：既然你派工作组压制群众，我就要解放群众，更要发动群众来反对你。何况，他对自己要发动的这一场清洗政敌的运动，早就认定是必须是“自下攻上和由外攻内”的。何况“现实的经验更值得注意”，倘若没有康生的老婆去北大蹲点勾结聂元梓等人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运动的火焰就能够从基层烧得起来吗？

好在事实已经给他提供了充足的炮弹。仅以北京为例：1966年6月4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革。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48名（有资料

说是六十多人)领导干部和反动权威被学生揪斗、毒打,史称“6 1 8 事件”。而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要把起来打人的造反派镇压下去。当时,据首都24所高等院校六、七两个月的一个并不完全的统计,各校工作组已经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领导和教师(——教授和讲师)打成了“黑帮份子和反动权威”,并且战果还在继续扩大和迅速扩大……

毛终于在表面上“抽身事外”。他号召了“横扫一切”,刘执行了“横扫一切”。从表面上看,他手上倒没有沾上工作组“横扫”人民的血腥,刘却满手都沾着“横扫”人民的鲜血……。毛在对此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精心地策划之后,不仅找到了击败对手的好办法,甚至找到了对政敌大打出手的好时机。好在他早已是“领袖和太阳”,事实已经证明,只要他发号召,登高一呼,“革命群众”就会听他的,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们也是不敢不从的。更何况,他是要“解放群众”,“救群众于刘少奇工作组的水火之中”呢?毛反倒成了普罗米修斯,刘却成了撒旦了!

但也正因为毛拥有着已经被神话的领袖地位,所以,他才在自己还不适宜公开发话、或自己还不适合公开动作的时候,他就会让他的“狗仔队”先闹起来。这个“狗仔队”,就是他的那个“阴谋小组织”,即已经登堂入室的中央文革小组。可以说,在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都是将自己置身于全体党人的领袖地位之上的。在“革命”不利于他,或“革命”需要以“破坏捣乱”为手段,或“革命”已经需要“大打出手”的时候,他都会派出他的“狗仔队”,不是到处煽风点火,就是到处大打出手。要是他的“狗仔队”闹过了,闹错了,闹得不利于他了,他就会出面“批评”他的“狗仔队”,当然是名为批评,实为保护。他用自己的阴谋小组织如此地对付刘、邓,如此地对付林彪,甚至也如此地对付周恩来……。

毛泽东在决心将刘、邓陷于“派工作组压制群众”的罪名之后,1966年7月18日,他胸有成竹地从南方回到了北京,并立即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汇报。

1966年7月22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会议先是听取北京高校目前“文革”运动情况汇报。之后,因归来的毛泽东壮了胆子,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立即发言大批市委工作组,说工作组怕群众,压制民主,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刘少奇驳斥了“文革”小组的发言,说:“我们有材料,你们这里挑动群众斗群众。”康生拍了拍皮包说:“我们也有材料。”于是,陈伯达重弹中央领导怕群众的调子,提出要从北京大学撤回工作组。邓小平霍地一下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陈伯达,厉声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那你们去前边试试!”他明确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刘少奇也明确讲:“多数工作组是好的……”。

1966年7月22日和23日,手中有了解令箭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陈伯达及江青两次跑到北京大学,公开地挑起了北大师生对“6 1 8”事件的辩论,公开表态说,毒打领导干部和教授的“6 1 8”事件是“革命事件”。

1966年7月24日和25日,毛泽东连续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谈了话,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他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还说:“运动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他进一步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他甚至说:“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斗争坏人它不舍得,批判学术权威它没有本领,改革教育制度它也不行,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90%以上的工作组都干尽了坏事。”

1966年7月25日晚上，也就是毛泽东发话的当天晚上，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便举起毛泽东的令箭，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批判北大工作组“镇压群众”，并提出撤销工作组。

1966年7月26日，刘少奇、邓小平不得不屈服于已经被“神化”的领袖，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决定，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邓小平代为起草、周恩来审定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很快，工作组就被毛泽东公开指责为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而刘、邓召开中央会议经过讨论才决定派工作组的行为，则被他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毛的“狗仔队”中央文革小组，可以说和他们的主人配合得如鱼得水。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把“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下的工作，说成是方向、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提出这次全会“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他甚至当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面说：“……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虽然刘少奇不得不承担责任，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明眼人应该是能够看得出毛对刘的用心了。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写道：“……从6月初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他没有点名，但是谁都知道，这个司令部里的司令，不是刘少奇还会是谁？

毛上述对刘少奇、邓小平“方向路线错误”甚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严厉责难，为两个月后他发动批判“资反路线”埋下了可怕的伏笔。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在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他已经明火执仗。斗争的矛头已经越来越接近他的目标了。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一再地指责刘、邓派出的工作组是“镇压”、“恐怖”，“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在毛、刘斗争的第二个回合中，刘少奇以派工作组维系刘家党的努力惨遭失败。毛泽东终于“随机应变地引导他的对手刘少奇犯了错误”。毛的文革大方向，也因此而获得了进一步的明确。

（待续）

□ 《黄花岗》2007年第1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